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研究的本土化反思^{*}

□ 谢小芹, 简小鹰

[摘要] 目前国内外社区参与研究存在从无到有的显性化研究的共性,但也存在内容、模式、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差异产生的根源可以从方法论和本体论层面给予解释。方法论层面而言,这涉及学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本体论层面而言,这涉及文化自觉的问题。通过比较社区参与的“来龙”的研究,基于反思的角度,认为中国目前社区参与研究仍然将社区作为一种客体的研究对象来看待,而并未将其视为研究主体。因此,中国社区参与的“去脉”研究理应是社区从一种“研究的客体”向“研究的主体”转变。这样,不仅有助于社会参与理论的完善和中国本土模式的建构,而且有助于对中国学术进行主体性内省。

[关键词]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中国研究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3-0047-07

Localized Reflection on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XIE Xiao-qin JIAN Xiao-y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3, China)

Abstract: Similarities in domination research could be seen in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research while differences are as well obvious in content, modes, and methodologies. The differences originate mainly from methodology and ontology. In the case of methodology, the academic issue of subjectivity is involved while the cultural spontaneity is considered when it is discus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flection".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n origin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research is currently considering community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rather than the subject of the research. Therefore, the predictiv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from "the objective" to "the subjective of the research", which would help not only to perfect the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theory and to establish a pattern with distinct Chinese feature, but also to prompt Chinese academe to proceed with subjective introspection.

Key Words: community participatory; rural tourism;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research

国 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研究都经历了一个显性化的研究过程。但与西方相比,中国式社区参与研究在理论、方法、内容及反思性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西方社区参与研究自成一体,较为成熟,这是学界的共识。但中国式社区参与

存在反思不足和主体性不强的问题,这主要源于方法论层面上的“主体性”的迷思及在本体论层面上的文化自觉的不足。

黄宗智提出“规范认识的危机”概念,即对“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

* 基金项目:中国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13YJ012)。

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的反思。“规范性危机”有助于我们对社区参与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他继续提到“我们现在的目标应该立足于中国研究自己的理论体系,并非是退回到旧汉学的排外和孤立状态,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把中国的经验与世界其他部分联系起来”(黄宗智,2000:446)。这表明黄宗智已经从本体层面意识到经典理论的局限性,即无论这些看似精巧理论都是基于西方历史实践产生的。在理论中可能是真实的东西,也许并不适用于实践([德]费希特,2010:26)。

社区参与的西方理论在运用于中国具体场域时,同样会遭遇“规范认识危机”,如果中国政治历史和社会经验一直被视为西方理论的研究客体,那么,“中国”也将丧失其真实存在性和本真性而变成由理论和概念聚合而成的“概念化”和“本质化”的事物。因此,这就需要我们不断进行反思。基于中国本土的经验研究,我们能够尽可能避免宏大理论自身具有的陷阱,也可在局部反思“规范认识”及其背后的西方社会科学的主体性问题,最终站在中国学术本土实践中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理论。西方社区参与的理论特质抑或可以消融在中国多元实践的具体场景中。

本文主要从中西方社区参与的旅游发展文献综述入手,在研究各自的研究脉络的“来龙”基础上,明晰化中国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去脉”,并提出中国学术研究的主体性问题。

一、西方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综述

(一)研究背景

在西方社会中,社区参与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政治学的“公众参与”,这是与西方民主制度相伴而生的。而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参与概念渗透到社会发展领域。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发展的主流思想是社区发展,这种思潮主要是动员民众参与和支持发展中国家建设城乡社区的基础设施,开发当地居民的能力,鼓励他们在社区事务中积极行动。这种社区参与带有开发发展中国家的倾向,因而稍具有殖民的意味。墨菲在1985年写成的《旅游:社区方法》第一次将社区方法引入到旅游研究中来,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该书中阐述了旅游业对社区的影响和社区的旅游参与,探讨了如何从社区角度开发和规划旅游。他认为社区是发展旅游业的一种资源,在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中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

有学者认为社区方法指的是当地社区最大限度

地参与旅游规划和旅游决策过程,并达到一定的可行性和合意度,最大限度地参与到实际发展和旅游管理中,并实现社区的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Inskoop E. Tourism Planning,1991:29)。此后,针对社区参与的旅游发展研究不断涌现。

(二)研究内容

西方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主要集中于旅游发展与社区的关系、社区在旅游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社区参与经历了从正面肯定到反思的阶段。

1. 对社区参与的积极肯定

社区参与对旅游发展的正功能在研究初期得到了肯定。

社区旅游作为一种发展旅游的方法,意味着受益人被鼓励参与自身的发展,通过动员他们自己的资源,明确自己的需要,并作出他们自己如何参与的决定(Stone L. 1989:207)。进而认识到社区支持是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要素(Butler R. 1997:122)社区是目的地增长管理中特有的重要因素(Simmons D G.,1994,15:98~108),居民参与是旅游业美好的明天(Brent Ritchie,J,1993:379~389),把社区导向看做旅游规划的发展阶段(Wall G.,1997:42),并从社区参与的视角研究合作理论在旅游目的地规划和发展中的应用(Tazim B J, Getz D.,1995:186~204)。

在对社区及公众参与旅游规划层面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学者认为,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政治行动已经修正了影响社会变迁、环境保护的现存制度和规划程序(Murphy P,1985:172),有的研究把社区导向看作旅游规划的发展阶段(Geoffrey Wall.,1997:42),并从社区参与的视角研究合作理论在旅游目的地规划和发展中的应用(Tazim B Jamal, Donald Getz, 1995:186~204)。有学者提出了市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各种技巧,如管理者导向的技巧,市民导向的技巧等(Marien C, Pizam A.,1997:164~178);Smith就参与项目评估的反馈机制提出了评估公众参与的程式(Smith L G.,1984:253~259);

在具体参与模式方面,也有不少研究。Petty(1999)对社区参与划分成了象征式参与、被动式参与、咨询式参与、因物质激励而参与、功能性参与、交互式参与、自我激励式参与7个层次(黎洁,赵西萍,2001:44~47)。Marcjanna Augustyn依据政府对旅游开发的程度,把乡村旅游开发模式划分两类:干预较大型(如波兰、西班牙)与干预较小型(如英国)(Marcjanna Augustyn,1998:191~209);Aliza Fleischer认为,有的国家的乡村旅游采取的是由政府发起引导的开发模式(如法国),而一些国家采取的是由下至上(bottom-up)并融合各种组织(包括

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开发模式(如德国、奥地利等)(Aliza, 1997:367~372)。

在社区参与案例方面,研究较多。爱德华·布鲁纳对非洲旅游社区的参与旅游发展进行了研究(爱德华·布鲁纳,2001),埃里克·科恩对东南亚的民族旅游与“社区参与”的研究(埃里克·科恩,2001),纳尔逊·格雷本等人对印尼巴厘岛、泰国的“山居部落”、肯尼亚马赛人民族旅游等社区参与的研究(杨慧、陈志明、张展鸿,2001)。这些案例研究皆基于西方社区参与理论,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

2. 关于社区参与的反思阶段

随着社区参与在实践中问题的凸显,有学者开始反问:社区方法,真正起作用吗(Murphy P, 1985:172)?大规模的社区参与能实现很多目标,但只是一个梦想而已(Taylor, G. 1995:171),发展中国家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存在着操作上的、结构上的和文化上的局限性,虽然并不平均地出现在每一个旅游目的地(Tosun, Cevat, 2000:613),社区旅游作为一种可持续的旅游规划方法,它只能建立在个人拥有公民权的机会和责任的现代公民社会中(Potts T D, 1998:133~142),言外之意,这就是社区参与是在西方土壤中滋生出来第一个概念,将其用于发展中国家,会出现一定的问题。

(三) 启示

国外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积极肯定到不断反思的过程,对其脉络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从缺失到凸显。社区参与的研究路径可以归纳为“无一规划的要素—可持续发展推进—社区发展—对其有效性的反思”这五个阶段,研究不断推进,取得不少成果。

二是社区参与是作为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随着发展问题的不断暴露,问题倒逼旅游发展不断创新和改革,作为一种有效的旅游发展和社区发展模式的社区参与理应成为首选,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将社区参与纳入到社区发展中来。摆脱就旅游论旅游的圈子,社区参与作为发展的资源和动力而扩大到社区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巨大。

三是对理论的反思。问题的出现也在不断促使学者进行反思,这种反思经历了从“研究客体”向“研究主体”的转变,理论发展较为成熟,体现出较为浓厚的主位视角味道,但这种主位视角具有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

四是社区参与有将非西方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区域研究的倾向,非西方作为西方社区参与研究的一个研究客体,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是用于回答西

方社会理论和实践中的问题,关心的是用异域的经验填补自身理论的空当,最终佐证西方正统理论的普及性。

二、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研究综述

(一) 背景

1997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制定颁发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实现与环境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正式提出社区参与的概念。此后,社区参与研究成为旅游研究中的一个新热点。提出将居民作为关怀对象,并把居民参与当做旅游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不可缺少的环节。此外,国外关于社会参与的理念不断被介绍进来。实践中问题的倒逼、政策文件的强调和国外的启发不断推动学者研究旅游业与社区关系的可持续发展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了对社区与旅游进行关联上的研究。

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作为全球第三产业的旅游业,可以成为社会尤其是农村社区发展的动力之源。社区参与不仅能实现社区价值的整合,而且还能成为当地社区发展的驱动力和增长点。因此,对社区参与旅游的“来龙”进行仔细梳理的基础上,并对其“去脉”进行明晰化,这对中国建设和发展尤其必要。

(二) 研究内容

1. 从“拿来主义”到“反思”

社区参与自从西方引入以来,备受学者关注。起初,学者几乎是不加批判的拿来就用,并赋予社区参与在旅游发展中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更加助推了对社区参与的关注。而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社区参与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反思。

(1)“拿来主义”阶段。鉴于社区参与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作为一个外来概念的社区参与开始在中国本土实践和研究。从社区角度来思考旅游开发问题有可能为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找到可行的途径(唐顺铁,1998:145~149;刘纬华,2000:47~52;乌恩,蔡运龙,金波,2002),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本质是维护社区居民权利,并依据社区居民的3项基本权利,提出9种参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支撑体系由政府、村委会、企业、社区居民等4方的行动体系构成(向富华,2012)。

规划学者也开始关注居民,倡导社区参与,并开始注重社区参与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保继刚,钟新

民,2002);在大部分研究出于关注旅游业才进而重视社区时,也有的研究把目光投向社区发展,并结合实际案例深入阐明了社区力量的重要性(文彤,2001)。在具体研究方面,有学者对社区参与的历史演化进程划分为个别参与、组织参与、大众参与和全面参与四个阶段(胡志毅,张兆干,2002:38~41)。有人尝试提出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范式,并在此范式指导下,对社区参与的动力、社区参与机制以及社区参与的公平分配等问题提出尝试性的解决方案(刘纬华,2002:98~103)。

(2)“反思”阶段。一些学者对社区参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有的研究对社区参与的动力、社区参与如何实现收入公平分配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质疑(黎洁,赵西萍,2001:44~47);在实践中,中国的社区参与远未实现,缺少一种激励机制来引导群众自觉参与保护(诸葛仁,陈挺航,特里·德拉西,2000:47~52),但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的经济利益冲突,对环境保护会造成负面影响,故要拓展多渠道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杨桂红,2001:124~126)。有的研究在介绍国外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开发例证时,进一步指出社区居民对生态旅游开发要进行全方位参与,才能分享旅游带来的各种利益,才能有助于生态旅游的成功(万绪才,朱应皋,丁敏,2002:70~71)。当前,社区参与需要在旅游规划、旅游地环境保护、旅游地社区文化维护等三个方面得到加强(胡志毅,张兆干,2002:38~41)。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主体不平衡,总体参与率低;参与领域不深入,局部参与占主导地位;参与形式单一,大量居民被动参与;参与意愿不强烈,参与信心不足等诸多问题(李广宏,2007:46~50)。

社区参与的反思阶段是对西方概念进行本土化反省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很好的促进社区发展和研究,但仍然存在基于西方话语分析上的反思和内省性不足的问题,其实质是社区研究的主题性并未真正确立起来。

2. 实证研究方面

众多人对社区参与类型进行分析。围绕一个点,对社区参与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不少。孙九霞等对农民参与状况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由于农民自身的原因及旅游发展阶段的制约,使旅游发展改变农民境遇的可能并不能迅速转化成必然。但社区旅游无疑为农民的生存困境提供了一条发展道路。至于这条道路究竟能够为他们带来多少改变,还是取决于制度框架下的政策关照和其自身能力的成长(孙九霞,2006:5)。继而,他们通过雨崩村、傣族园和世外桃源的案例分析了社区参与现状、方式、成效及问题等(保继刚,孙九霞,2008;孙九霞,保继刚,

2004:7;孙九霞,保继刚,2006:5)。有人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以中甸碧塔海旅游景区社区参与状况为例,阐述社区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由于碧塔海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的方式单一,市场容量有限,所以,只有不断拓展社区藏民参与旅游业发展的途径,使他们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才是重新激发社区藏民保护碧塔海环境的出路(杨桂红,2001:124~126)。

(三) 启示

国内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较为丰富,但因起步较晚,虽大量研究不断涌现,但仍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国内关于社区参与方面,理论分析欠缺,理论的运用也存在蹩脚的现象。偏重于案例分析,但不够深入。

二是仅限于西方理论的分析框架,对西方概念进行话语解读,真正原创性的、得源于中国现实特点的理论探讨欠缺。对社区参与有一定的反思,但这种反思并没有跳出西方的理论框架。顺理成章,中国的社区参与理论成为西方理论的“拿来品”,丧失了本土化反思的机会。

三是仅仅将社区作为“研究客体”来看待,未能将社区视为“研究主体”。即便是在反思阶段,有将社区从研究客体向研究主体转变的趋势,但仍摆脱不了西方主位视角下的反思。这样就遮蔽了社区参与理论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和丰富性。

四是迎合了西方将中国社会作为自身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脚注的需求。西方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带有浓厚的学术殖民色彩,并将非西方作为西方社会的一个区域社会来考察,最终针对的是西方的学术命题。而中国社会也在西方正统和宏大理论下进行经验解读,期待以为这种理论的标准化和普遍化作为例证或填补空白,难以规避将中国的实践经验硬塞到西方理论框架中的现象。无论是西方对非西方社会研究的反思,还是非西方对自身的反思,其最终指向仍然陷入到西方中心主义泥塘中。因此,中国社区参与研究存在主体性长期缺失的境地。

三、社区参与研究“来龙”的比较及中国研究的“去脉”分析

(一) 国内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来龙”比较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鉴于西方和中国发展情况不同,中西方对其研究也存在很大差距。

一是共同点:社区参与的显性化研究。中西方关于社区参与的旅游开发的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西方国家在社区参与方面研究较为成熟,形

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而中国比西方国家起步晚,因而研究也显得不够成熟,在理论和经验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

二是不同点:社区参与反思程度不同。具体而言,中西方无论是参与程度、条件、模式,还是参与力量、利益分享及规划等方面皆存在很大差距,而上升到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其本质是社区视为“客体”还是“主体”的性质之争。西方参与式的反思经历了从客位到主位的过程,将社区作为“研究主体”,完成了研究的主体性转向,这是基于西方本土不断进行反思的结果。而中国关于社区参与的研究仍停留在对西方概念的话语解读方面,并未超出将社区作为研究客体的域阔,社区参与并未实现从“他者”向“自我”的转变,最终就遮蔽了社区参与本土化的研究,导致中国经验仅仅是为西方做注释的有限意义。

(二)中国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的“去脉”分析

明晰了社区参与的“来龙”后,未来走向的“去脉”问题才会走出迷雾。社区参与的主体性研究是其未来的正确定位。学术的主体性是属于超越并决定具体观点和分析方法的本体论层次问题,笔者主要从这个角度来重新理解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研究。将西方社区参与研究作为比较对象,中国的研究可以明晰未来的走向问题。中西方在参与的具体问题方面存在差距的根源在于可以从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进行分析。

就方法论层面而言,这属于研究方法论上的性质的问题。其本质的差别在于西方注重的是社区参与的“研究主体”问题,而中国注重的是“研究客体”问题。西方社会参与经历了深入反思的阶段,目前其研究的主体性很好搭建起来了。西方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始终将其作为“他者”,带有较强的学术殖民化色彩,这就是将中国场域仅仅作为社区参与理论的一个试验场,其最终指向并未解决中国学术问题,而是将“中国社区”嵌入西方的表述语言中,并运用丰富的经验进行填充西方研究的空白地带的目的。甚至他们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而并非仅仅是学术领域的问题。而中国自身对此的研究具有浓厚的“舶来”性质,存在仍将社区作为一种客体的研究对象,仅仅将社区视为研究的工具和发展的手段,未能赋予社区一种主位性和主体性。即便是有所内省,但也只是在西方视角内部进行稍微的调整,最终仍然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变化,都只是将中国作为不属于自己的“他者”的过程,都只是“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刘东,2004)。

就认识论层面,这涉及文化自觉的问题。中国经验与西方经验存在不同,而呈现出自身的发展动力、模式和机制方面的独特性。这就启发我们学会

对外来的正统和宏大理论和概念进行本土化的深刻和主体性反省。这种主体性并不是自我的夸大,而是一种主体之间的互动。这是一种基于高度自觉基础上的主体间性。目前中国社区参与研究陷入困境的缘由就是对中国历史经验进行概念化解读的结果,是简单的借用和套用西方理论和模式,试图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中国社会经验套入到西方社区参与理论中。

“主体”缺位成为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止步不前的根源,站在西方理论巨人的肩上,抑或可以创造出中国本土化的理论,这将是学术主体性道路前进方向。解决这一困境的良好路径就是从社区参与的规范性认识危机中走出来,赋予社区参与研究的主体性,实现从“社区参与的研究客体”向“社区参与的研究主体”的转变,最终上升到将“中国客体研究”置换为“中国主体研究”。

四、中国学术研究的主体性

本文把规范性认识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他们的影响不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黄宗智,2000:420)。这是规范性危机产生的根源,这也是当前中国社会在西方正统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凸显出较多问题的根源,“食洋不化”这几个字看似简单,实则蕴含了规范性危机的深刻内涵。当下中国的研究部分呈现出这四个字所描绘的景象。中国本土实践中的社区参与不足和伪参与现象使得学者几乎一致性的认为要从改造中国社会土壤着手,他们认为社区参与需要较强的民主观念和公民意识,因此,他们迫切的呼吁倡导对中国社会土壤用“西方化”肥料进行浇灌、用西方土壤替代中国土壤,甚至恨不得将中国改头换面成西方的社会并最终达到实现社区参与的目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三方面的误区:

第一,他们并未真正看到社区参与的前提和基础,却淹没在宏大和权威理论和概念的大潮中。社区参与倡导的美好理念是构成激发这些学者疯狂倡导的缘由,对概念的钟爱和崇尚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概念的结构条件约束,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主义者。机械照搬,丧失了批判和反思能力,“机械啮合”成为规范信念的犬儒主义者。

第二,他们虽然是在中国的场域内做的是中国研究,但实际上我们将其视为为西方做注脚和解释则更为恰当和合理。不断为西方做注脚,并充当填补西方研究的空白区域地带的角色,成为典型的西

方中心主义者。同样,不加以反思,不注意研究中的主体性问题,也就丧失了自身研究的合法性来源。身在中国场域心在西方理论中心,是“理论媚外”的典型表征和长久形塑出的一种惯习。

第三,同样,他们也颠倒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违背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宗旨,殊不知,让中国社会土壤去适应滋生于西方土壤的理论实际上是将上层建筑视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削足适履”暴露无遗。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值得反思,中国学术研究同样值得反思。由于理论的外来性,一开始,中国通常被作为“他者”的面貌而出现。因此,中国研究具有将自身客体化,并蕴含着中西二元对立的内涵。本土化和批判反思的精神能够将之不断向研究主体方向推进。真正的中国学术研究应是将中国当做主体,从中国丰富的现实和历史传统中提炼出真正具有解释力的本土社会科学理论。中国学术研究的情结理应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社会科学理论的超越性和中立性价值理应是超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学术性,这种超越恰好是要建立在对自身文化和学术意义上的民族特性的深刻理解上。因此,在借鉴国外理论并认识到这种理论强大的解释力的同时,更要清醒认识这种理论始终是非本土土壤所产之物,并始终与这种外来理论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一种研究上的自觉心态和行为。丰富多样的实践经历和材料才能确保对已有理论的反思和促进新理论的产生,这样诞生出来的学术生产链条才是鲜活的,才是流动性的,才具有动态性。在我自己的经历当中,源自于第三世界的分析概念比基于西方经历的模式有用(黄宗智,2000:429)。黄宗智道出了基于调查研究基础上得来的原创性概念和理论的重要价值,这种价值是在中西不同主体性之间能够相互融通。如果只是从一些概念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这样的话就难以规避套用概念和理论的危机。因此,从中国本土历史和传统文化入手,就是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这样,学术的主体性才能很好的坚守。只有这样,中国研究的主体性和本土化转型才能更加顺利,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Perry,1999)。

西方理论是学术的利器,必须掌握才能超越,中国研究不单只是在消费西方他者的理论,而也是在生产自我的理论。也借以连接(多是来自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实际(因为实践乃是这样的连接的体现),通过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来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和理论(黄宗智,2012:18)。

因此,中国研究未来的走向理应是“中国”作为一种“研究主体”,赋予中国研究的“主体性”位置。

“中国学术研究”可以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却不是以此为最终指向,“中国学术研究”可能会参照和学习西方社会参与理论,但绝非西方社会参与理论的扈从,“中国学术研究”可能会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的关照,但绝不是对西方社会科学关照的顺从。“中国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且必须具有主体性,是因为中国这个“民族”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必然具有主体性。中国具有主体性的学术研究理应走一条经验研究的道路,经验研究反对将概念本质化和固定化,而中国经验可以将零碎的现象聚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关键在于经验研究道路的正确性。经验研究反对将概念本质化,认为社会理论是对事物存在与变迁逻辑的抽象。由于“实践逻辑”不具有理论的单一完整性特征,当研究从实践经验出发时,矛盾而丰满的实践过程可以刺激研究者看到不同于理论逻辑“悖论”的社会现象,这构成新认识的起点。“有中国主体性的学术”不是纯粹的理论概念体系,其终极目标是,“在建设性的现实关怀下,可以通过过去这些方法的实践来探寻其中的实践智慧,由此来建树今天可用的方法”(黄宗智,2012),中国主体研究并不排斥吸纳与国外研究的共享和借鉴,但其研究始终是“自我化”而非“他者化”的过程。☒

[参 考 文 献]

- 黄宗智,2000.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中共的悖论现象[A].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
- [德]费希特,著,潘德荣,译,2010.国家学说[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 黎洁,赵西萍,2001.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理论的若干经济学质疑[J].旅游学刊,(04).
- 爱德华·布鲁纳,2001.民族旅游:一个族群,三种场景[A].杨慧,陈志明,张展鸿,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埃里克·科恩,2001.东南亚的民族旅游[A].杨慧,陈志明,张展鸿,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杨慧、陈志明、张展鸿,2001.旅游、人类学与中国社会[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唐顺铁,1998.旅游目的地的社区化及社区旅游研究[J].地理研究,(02).
- 刘纬华,2000.关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若干理论思考[J].旅游学刊,(01).
- 乌恩·蔡运龙、金波,2002.试论乡村旅游的目标、特色和产品[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03).
- 向富华,2012.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7).
- 保继刚,钟新民,2002.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1—2020)[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
- 文彤,2001.旅游与社区发展:以桂林龙胜县平安寨为例[D].广州:中山大学.

- 胡志毅,张兆千,2002.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J].人文地理,17(2).
- 刘纬华,2002.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研究应有的理论视野——兼与黎洁老师商榷[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
- 诸葛仁,陈挺舫,特里·德拉西,2000.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中社区参与机制的探讨[J].农村生态环境, (1).
- 杨桂红,2001.试论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业发展对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以碧塔海旅游景区为例[J].经济问题探索, (11)26.
- 万绪才,朱应泉,丁敏,2002.国外生态旅游研究进展[J].旅游学刊, (02).
- 李广宏,2007.社区居民参与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探讨[J].黑龙江民族丛刊,23(4).
- 孙九霞,2006.守土与乡村社区旅游参与——农民在社区旅游中的参与状态及成因[J].思想战线,32(5).
- 保继刚,孙九霞,2008.雨崩村社区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及其增权意义[J].旅游论坛,1(1).
- 孙九霞、保继刚,2004.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以西双版纳傣族园为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6(6).
- 孙九霞、保继刚,2006.社区参与的旅游人类学研究——阳朔世外桃源案例[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8(1).
- 刘东,2004.熬成传统——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J].开放时代, (6).
- 黄宗智,2012.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J].开放时代, (01).
- Inskiep E. 1991. Tourism Planning, An Integrated and Sustainable Approach[M]. The Hague: VanNostr and Reinhold.
- Stone L. 1989. Cultural Cross-road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ment: A Case from Nepal[J]. Human Organization, 48.
- Butler R. 1997. Modelling tourism development: evolution, growth and decline[A]. Salab Wahab & John J. Pigram.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Growth[C].
- Simmons D G. ,1994.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planning [J]. Tourism Management, 15.
- Brent Ritchie, J. ,1993. Crafting a destination vision — putting the concept of resident—responsive tourism into practice[J]. Tourism Management, 14(5).
- Tazim B J, Getz D, 1995. Collaboration theory and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2(1).
- MurphyP. ,1985. 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M]. New York: Methuen.
- Geoffrey Wall. ,1997. Sustainable tourism—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Salab Wahab, John J Pigram (ed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Growth[C].
- MarienC, PizamA. ,1997.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lanning process[A]. Salab Wahab, JohnJPigram(eds.).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Growth[C].
- SmithLG. ,1984.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making: the state of —the—art in Canada[J]. Geoforum, 15(2).
- Taylor, G. , 1995. The community approach: does it really work? [J]. Tourism Management, Vol. 16, No. 7.
- Tosun, Cevat. , 2000. Limits to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Tourism Management, 21.
- Potts T D, 1998. Harrill R. Enhancing communities for sustainability: a travel ecology approach[J]. Tourism Analysis, 3.
- Marcjanna Augustyn, 1998.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the Polish experience[J].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6(3).
- Aliza. 1997. Fleischer Rural tourism in Israel [J]. Tourism Management, 18(6).
- Perry, 1999. Partners at Fifty: American China Studies and the PRC [M]. Washington: Paper for Conference on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收稿日期 2014—02—18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苏兰清]

[作者简介] 谢小芹(1986~),女,四川南充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生。北京,邮编:100193。邮箱:xiexiaoqin2005@126.com。简小鹰(1961~),湖北人,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研究方向:农村社区发展、农村社区发展规划与管理、农村发展项目、农村推广体系。北京海淀区,邮编:100193,邮箱:jianxy@cau.edu.cn。